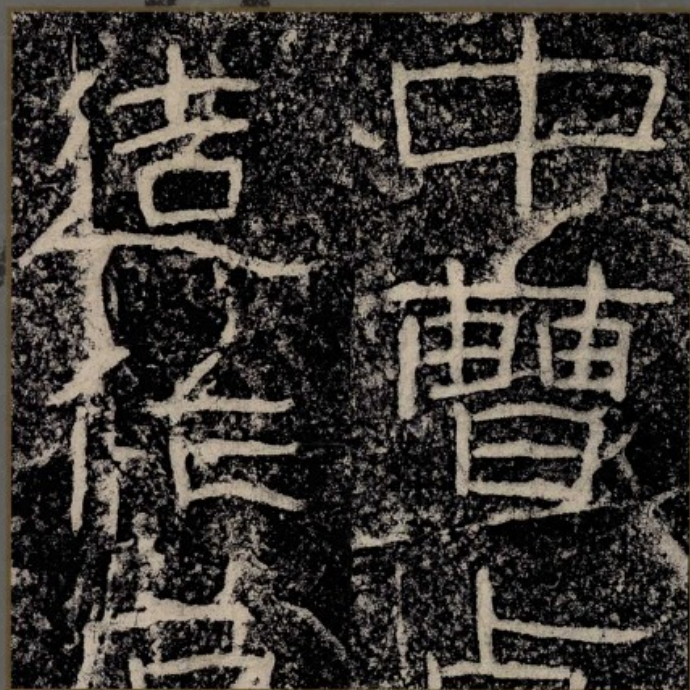


名碑善本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名碑善本



主编：施安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名碑善本

Rare Book of Famous Stone Inscriptions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 编：施安昌

副主编：许国平

编 委：尹一梅 王 祎

摄 影：刘明杰 马晓旋 孙志远

出版人：陈万雄 胡大卫

编辑统筹：张倩仪

出版顾问：吴 空

责任编辑：徐昕宇 周祖贻 王占军

设 计：张婉仪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71号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湾耀兴道3号东汇广场8楼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制 版：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版 次：2009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008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繁体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简体版）

规 格：大16开(216x286mm)256面

国际书号：ISBN 978-7-5323-9698-6/J·93

版权所有，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本版图书仅在中國大陸地区发行。

Condition of sale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distributed in Mainland China only.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襄 王 尧 李学勤
张政烺 金维诺 宿 白

总编委主任委员：郑欣淼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杜乃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辉柄
余 辉 张忠培 邵长波 陈丽华
杨 新 杨伯达 单国强 郑珉中
郑欣淼 胡 锤 施安昌 耿宝昌
晋宏逵 徐邦达 徐启宪 聂崇正
萧燕翼

主 编：李文儒 杨 新

编委办公室：

主 任：徐启宪
成 员：杜乃松 李辉柄 余 辉 邵长波
陈丽华 单国强 郑珉中 胡 锤
施安昌 秦凤京 郭福祥 聂崇正

总摄影：胡 锤

总序

杨 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一九二五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中间虽屡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乾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溥仪居内廷时，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一九二三年中正殿大火，清宫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二十八册，计有文物一百一十七万余件（套）。一九四七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公元一四〇六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下诏将北平升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旧宫的基址上，开始大规模营造新的宫殿。公元一四二〇年宫殿落成，称紫禁城，正式迁都北京。公元一六四四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国统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内。按古老的礼制，紫禁城内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后寝包括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等，总称内廷。明、清两代，从永乐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二十四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这里。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文物移来，在紫禁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一九二四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从大量的藏品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二千九百七十二箱于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被运往台湾，五〇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二千二百一十一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拨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保管。

五〇至六〇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予「故」字编号，计有七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八件，其中从过去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一千二百余件。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一九四九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凡属新入藏的，均给予「新」字编号，截至一九九四年底，计有二十二万二千九百二十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和近世。历朝历代，均有佳品，从未有间断。其文物品类，一应俱全，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

科学术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故宫。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宫的藏品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忠诚合作！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们进行这一事业的人们！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于灯下

导言

施安昌



中国古代先民在石头上镌刻文字的历史颇长，「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也就是想利用石材坚固、不易损坏的特性，使文字所记载的事情得以长久保存。刻石具体兴起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刻石遗存有二。一是九三〇年代，在河北平山县东周城址和墓葬区发现的《公乘德守丘刻石》，其上篆书铭文十九字：「监罢尤（圉）臣工公乘德，守丘丁（其）血曼，敢谒后□贤者。」大意是说：监督管理园囿的名叫公乘德的官和看守陵墓的一个叫血曼的武将，共同敬告后世的贤人。二是战国时秦国的石碣，因其状如鼓而称石鼓，存世共十个，其文是十首诗，称《石鼓文》，多记述秦国贵族狩猎之事，内容较前者更为丰富。

刻石真正流行，是从秦、汉之世开始的，至东汉后期大兴，「碑碣林立，遍布全国」。以至于宋人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道：「自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文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后始有也。」及至魏晋南北朝，虽政府屡申刻碑禁令，然墓志、摩崖、造像记等形式之刻石仍有发展。隋、唐承北朝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于是，自隋唐以降，刻石又复大盛。近在京畿，远及边陲，石刻文字，几遍中国。其内容博大，品类繁复，传拓广远，承续不绝。究其原因，文字绵延一贯与讲求书法是两大要素。于是，石刻文字繁衍滋蔓，不仅为后人保留了永久的历史文献，而且为人类贡献了永恒的书法艺术。

一、碑的释义与分类

碑的本意是指方形或长方形竖石，许慎《说文解字》云：「碑，竖石也。」碑的起源，最早见于周代。初始的碑，并无文字，主要用作拴牲畜、测日影计时和墓葬下棺时架辘轳，与后世的刻辞碑有明显差别。《礼记·祭仪》云：「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此指庙碑，为系牲畜而设。《仪礼·聘礼》云：「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此指宫碑，为测日影计时而设。《释名·释典艺》云：「碑，被也，墓葬时所设，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此指墓碑，为葬棺架辘轳而设。蔡邕《郭有道

碑》：「于是树碑表墓，昭铭景行。」《新唐书·姚崇传》：「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此指刻辞碑，在竖石上镌刻图案或文辞，记死者生平功德，作为纪念物或标记而设，亦可用以刻文告。本卷所介绍之碑，泛指所有书刻文字之刻石。涵盖了刻辞碑、墓志、石阙铭、摩崖、石经、造像记、题名及诗文题咏等等。下文对其逐一介绍。

刻辞碑按其内容和作用可分为：墓碑、功德碑、宫室庙宇碑。墓碑是用来记载死者事迹生平，病卒和安葬的时间以及家世，并表哀悼之情。如东汉《泰山都尉孔宙碑》（图12）、《豫州从事尹宙碑》（图20）、唐《皇甫诞碑》（图38）、《道因法师碑》（图48）。功德碑范围很广，上至帝王下至良吏、名人建功立德，或者某件重要的事受到颂扬而立石均在其内，如东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图82）、《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功碑》。宫室庙宇碑立于宫庙院内外，记载该建筑建设的缘由、规模、兴衰历史，主其事者的情况，如东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图10）、《西岳华山庙碑》（图13）、唐《九成宫醴泉铭》（图35）、《晋祠铭碑》（图39）等等。

墓志是墓碑的变形，埋在地下墓中，其内容与碑文大同小异。墓志滥觞于东汉而流行于魏晋之后，其流行与当时的官府屡申禁止立大碑有关。当时禁令之严，迫使一部分人改大碑为小碑，并藏于墓穴，由此逐步形成风气。墓志形式初期是一块方石，北魏时变为上下两块方石合成的盒状，上面志盖篆题，下面刻志文，并为后世沿袭，如晋《尚书征虏将军幽州刺史城阳简侯石彪墓志》、唐《王之涣墓志》皆属此类。

石阙是指古代宫殿、祠堂或坟墓前所建的高柱形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两台之间留有空缺以为通道，故名「阙」。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云：「盖为台于门外，人君作楼观于上，上圆下方。以其阙然为道，谓之阙；以其上可以远观，谓之观；以其悬法，谓之象魏。」石阙约出现于周，兴盛于汉，隋、唐以后较为少见，但其形制遗存今仍可见。初始的阙主要设于宫门两侧，是有实用价值的建筑物。后来逐渐由实用演变为宫门、天门乃至朝廷的象征物，并扩及到庙阙、墓阙等。石阙上多刻铭文与浮雕纹饰，如东汉的《嵩山三石阙》（图6）、东晋的《杨府君神道柱》等。

将文字刻在山崖石壁上或为纪念或为观赏，称摩崖。许慎《说文解字》云：「崖，山边也；摩，研也。」清代冯云鹏《金



石索》云：「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兴起于汉，北朝多刻佛经，唐以后镌刻山水题咏成为风气，且至今不衰。位于汉中的《郾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图5）、《司隶校尉杨孟文颂》（图8），位于湖南祁阳的颜真卿书《中兴颂摩崖》（图75）等，皆属此类。

造像题记兴起于南北朝，是指在石上雕造佛龕佛像，附刻供养人姓名和发愿文。佛像和造像题记或刻于崖壁之上，如泰山东北麓白虎山《千佛崖造像》；或存于石窟之中，如著名的《龙门二十品造像记》；或在石碑之上，如洛阳的北魏《刘根造像及题记》、《曹望情造像及题记》。图像与题记都十分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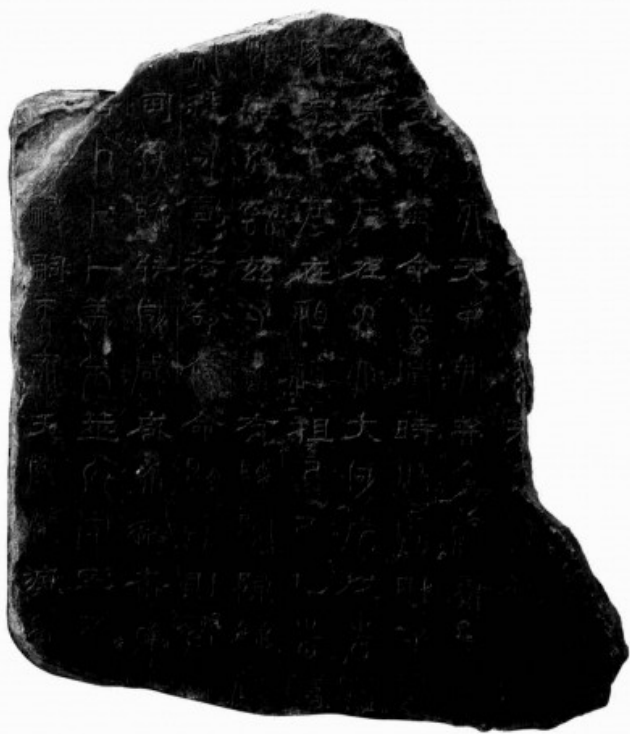
将古代经典论著刻在石上借以流传即为石经。儒、释、道三家皆有石经，其中儒家、释家刻经数量庞大，而道家刻经甚少。

石经中最著名者，如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一七五）在洛阳太学刊刻儒家石经，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论语》七经，称为「熹平石经」（图19）。又如三国魏正始年间（二四〇—二四九年）刊刻的《尚书》、《春秋》，用古文、篆书和隶书三体写出，称为「三体石经」或「正始石经」（插图一）。以及唐文宗开成年间（八三六—八四〇年），刊刻儒家十二部经典，称为「开成石经」。

（插图一）

湖山佳处，林深庙宇，游览所及，率有留题姓名、官职、年月、事由者，称为题名。其文字虽简，却于考证颇有益。如颜真卿至华岳庙在北周《华岳颂碑》右侧题刻，即《谒金天王祠题记》（图73）。另有官吏任职题名和科举题名，唐长安《御史台精舍碑》、《雁塔题名》则为重要者。

诗文留于山石，是为诗文题咏，这类铭刻与摩崖、碑记类似，然



其重在文字意境与文学价值。如唐薛曜书《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秋日宴石淙诗序》在嵩山崖壁；瞿令问篆书《嵒台铭》则在湖南祁阳浯溪，都是文辞优美的佳作。

上述之外的其他石刻文字，如有文字的石堂、井栏、桥柱、神位等，往往被泛称为「刻石」。尤其当所指石刻文字并无特定形制时，习惯称作「刻石」而不称「碑」。如前文所述之《石鼓文》（图1），秦始皇巡游各地纪功石刻如《峰山刻石》（图2）、《泰山刻石》（图3）等，都属此列。但它们作为「碑」之源流、旁支，在碑刻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本卷也加以介绍。

二、碑刻的价值

古代碑刻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为历史学、文学、文字学和书法史、美术史都提供了宝贵资料。碑刻之文，多为当时人记当世之事，其中有些内容，是史籍资料所匮乏的，可以用来证史、补史，填补历史空白。诚如清末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所言：「吾辈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此外，诗文题咏、墓志碑记等石刻，多为名家撰文，文辞优美，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更为重要的是，碑刻在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其文往往是历代书法家之大手笔，而他们中许多人已无传世墨迹，碑刻遂成为后世观赏、研习其书法的珍贵资料，故有「书以碑传」之说。在此仅以唐代为例，略述碑刻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

唐代有十二位大书法家，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亲笔墨迹早已消失殆尽。其书法风格面貌如何，后人主要是靠传下来的古代摹本和碑刻看到的。特列「唐代书法家存世墨迹与碑刻对照表」，将各位书法家的作品，包括碑刻和墨书摹本分别列出来作个比较，即可发现碑刻于书法之重要。



唐代书法家存世墨迹与碑刻对照表

书法家	碑刻	墨书摹本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	
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宗圣观记》、《房彦谦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	《仲尼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
褚遂良	《伊阙佛龕碑》、《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	《倪宽赞》
薛稷	《信行禅师碑》	
孙过庭		《书谱》
李邕	《任令则碑》、《李秀碑》、《李思训碑》、《端州石室记》、《卢正道碑》、《麓山寺碑》、《灵岩寺碑》	
颜真卿	《八关斋会报德记》、《多宝塔感应碑》、《元结墓表》、《李玄静碑》、《东方朔画像赞碑》、《金天王庙题名》、《宋璟碑》、《殷府君夫人碑》、《郭家庙碑》、《离堆记》、《麻姑仙坛记》、《臧怀恪碑》、《颜氏家庙碑》、《马磷碑》、《郭虚己墓志》	《竹山堂联句》、《自书告身》、《祭侄文稿》、《刘中使帖》
徐浩	《大证禅师碑》、《不空和尚碑》、《嵩阳观圣德感应记》、《张庭珪墓志》	《朱巨川告身》
张旭	《郎官石柱记》	《肚痛帖》
怀素	《圣母帖》、《藏真帖》	《自序帖》、《苦笋帖》、《食鱼帖》、《论书帖》
李阳冰	《三坟记》、《栖先莹记》、《城隍庙碑》、《滑台新驿记》、《黄真德政碑》	
柳公权	《玄秘塔碑》、《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功碑》、《李晟碑》、《苻璘碑》、《高元裕碑》、《冯宿碑》、《魏公先庙碑》、《刘沔碑》、《金刚经》、《回元观钟铭》	《蒙诏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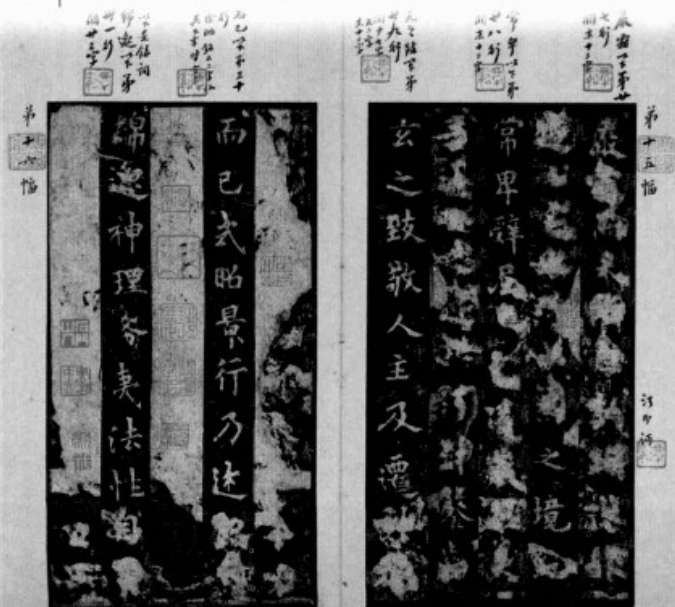
晋、唐书法，乃中国书法史上两座瑰丽耀眼的高峰。从上面唐代书家作品的流传情形看，绝大部分书迹都保存于碑刻之上。正是依靠碑刻，书家方能影响后世，书艺才得以长久继承。

三、碑以拓传

将碑石上镌刻的文字、图案捶拓下来，称为拓本，也可称「碑帖」。有了拓本，观看、临摹、研究都很方便，有利于碑刻文字的广泛流传和长久保存。特别是当许多碑刻因年代久远屡遭风蚀、火灾、战争等灾祸之毁坏，或文字湮灭，或碑石残损，甚至毁灭，拓本的存世，就愈发珍贵，更具特殊的意义。如《石鼓文》（图1）为战国刻石，旧散弃于荒野，湮没无闻，唐初在陕西天兴县（今陕西凤翔）被发现，此后千余年间，存放地点屡次更迭，石鼓已受较重的创伤。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元人潘迪在《石鼓文音训》中称「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余年，昔之所存，今已磨灭数字」。于是，今世所存宋代石鼓拓本，就成了研究其文的最重要资料。诚如马衡所言：「石鼓拓本，向皆奉天一阁藏宋拓为不祧之祖。摹刻虽存数本而原本久佚，不可踪迹矣。清末发现明安国所藏宋拓十本，于是吾人眼福突过前人。」拓本于碑刻之重要，由此或可见一斑。

对于石刻的研究风气，开端于宋。作为宋代两部集录和考订金石文字的专著——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在搜集、研究了大量刻石拓本之后撰写出的。《集古录》十卷，收入石刻题跋四百余篇。《金石录》三十卷，收铭刻两千种，跋尾五百余篇。前十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每一条下注年月和撰书人姓名；后二十卷为跋尾，辨证文字内容。从这些著作也反映出，当时人主要是依据拓本进行研究的。中国的金石学由此而开创，相承发展了近千年，至清乾嘉以后尤炽，还出现了专门研究碑拓的「碑学」。

捶拓碑刻始于何时？或有不同说法，然目前公认的最早拓本是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太宗书《温泉铭》。此拓本末尾有唐人题字一行：「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见（残）。」永徽是唐高宗年号，题字是唐初人亲笔所书，故拓本必在此前。同时发现的拓本还有唐欧阳询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图34）和柳公权的《金刚经》，



其纸墨相近，估计传拓时代相近。这几种唐代拓本，拓工颇佳，说明捶拓技术在唐代以前已经产生。这一点，从《隋书·经籍志》中「汉魏石经」条还可得到印证：『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书。魏正始中，又立三体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至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辑，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

这里的「相承传拓之本」，是指石经拓本，那自然是在汉魏之时所拓。其实传拓金石与铃印在技术上是相似的，在历史上两种技术很可能是同时或稍有先后地被人利用。不能因为今天我们所知文献和所见实物的限制而将传拓的出现看得过晚。对这一问题争议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拓史，而且还在于拓本的断代。因为按照明清金石家习惯，最旧的拓本就是宋拓善本，唐拓则靠不住。直到敦煌唐拓被发现，才突破了这一传统定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捶拓（或称传拓）技术的出现，不但使石刻的文字和艺术得以流传和发展，而且是印刷术发明的前奏。既然可以将石刻上的文字拓印下来，那么采用更易于雕刻的材质镌刻文字，然后大量拓印，就可以省去以往手抄书籍之累了。隋唐时期，工匠们根据拓碑的原理，将书籍抄录在薄纸上，反贴于木板之上，用刀雕刻成文字凸起、其余部分凹下去的阳文，然后采用捶拓的方法把文字复印出来，这就成为最初的印刷术。由于文字是雕刻在木板上的，所以叫雕版印刷。一本书的字数自然是相当多的，所雕的板也不止一块，每一块都照这种方法刷印成文。全部印刷工作完毕，一页一页地装订起来，就成了一本书。有了雕版印刷，就免除了笔札之劳，而且一块雕版可以用许多次，要印多少，就可得到多少，这就大大方便了书籍的生产。

四、拓本的考据与鉴赏

如前文所述，拓本对碑刻而言，意义非比寻常，但一碑往往有多个拓本。捶拓有早晚，拓工有精粗，拓片自石上揭下，便具有独立的文物价值。而且，拓本版本、时间的不同，对研究碑刻而言，价值也不同。捶拓越早，拓工越精，其文物价值越高。那么，该如何判断碑的旧拓本捶拓的时间呢？这需要通过校碑的方法。校碑时将同一碑的几个不同时间的拓本并观，其风格笔体、字句多少、笔画完整、石花形状（指碑面磨损表现在拓本上的白色痕迹）等等，都要仔细比较其异同。此法要点有三：一、同一拓本碑的早拓本保存字多，晚拓本保存字少。二、某些字在早拓本中尚且完好而晚拓本已经损泐。三、

晚拓本与早拓本比较，往往出现了石花和裂纹，时间越晚越严重，有的损及文字，有的在字里行间。

早拓本比晚拓本多存的字或完好的字，晚拓本比早拓本多出现的或者后来逐渐扩大的石花和裂纹，是两个用来鉴定拓本时代早晚的重要依据，通常被称作「考据」。这个「考据」的含意即是：借以考察拓本时代的根据。对于不少碑拓，人们在鉴别其时代早晚时，根据前人记载和实践经验，已经发现了一系列的考据，分别可以作为不同时代拓本的标志。这些考据构成了一个考据序列，记下了碑石面貌的历史变化，就像考古发掘中层位的叠压顺序可以反映出遗址的历史变迁一样。将考据和文字书法面貌、墨色、纸质、题跋、印鉴、装裱等项结合研究，使得碑帖版本的鉴定趋于细致，条理和科学。

由上文可知，校碑的方法与考据的确定是以占有同一种碑的多件不同时期的拓本为基础的。拓本多，观察细，分析合理，方能发现考据，建立起考据的序列，此其一。宋、元、明拓的鉴别，有赖于相应时代的考据之掌握，而早期的考据只有从早期拓本上才能发现。因此，搜集明以前的古拓本对于将考据序列向上推进来说就非常重要，此其二。碑帖的面貌与历史变化借拓本得以再现和保存下来，而与捶拓技术高低关系密切。拓工精良（包括纸、墨适合）者，能够准确、清晰、完全地表现碑帖真实面目；拓工粗劣（模糊、走形、失拓）者，则不能。故欲认真释读、研究碑帖者必依靠精拓本。这一点，人们往往忽视，此其三。

上述三点是碑帖鉴藏者须注意的校碑原则，兹举二例说明。

（一）《司隶校尉鲁峻碑》，《校碑随笔》指出旧拓最早的考据是：「第十二行『宣尼』二字，第十六行『遐迹』二字，皆未损」，「若『遐迹』之『迹』字末笔完好则第十五行『允文允武』『武』字可见。」（清方若《校碑随笔》，西泠印社聚珍本，一九一四年）故宫博物院藏此碑早拓两种，一是明拓「武」字不损本，另一本是丁彦臣同治庚午（一八七〇）所得并跋本。后者不但「宣尼」、「遐迹」等字完好，而且较宋代洪适《隶释》还多第十一行「汝南干商」之「商」字，第十六行「当迁绳职」之「迁」字尚存，故可确认为宋拓。

（二）《卫景武公李靖碑》（图44），《校碑随笔》分析：十二行「断鳌」二字未损，十一行「鼉」二字未损，是明拓早期考据。昔朱翼庵先生先获一明拓，江西刘穆庵旧物。十



年后寻得另一本：「此本为程穆倩旧藏，纸墨毡腊俱极精古。碑后半『追踪昭伯腾映前猷』之『猷』字，起首一点，予所见明拓本无不损者，此独完好，为此碑打本在前之证。」（一九三二年跋），「碑中『王』字已凿损，是金海陵以后所拓，犹在宋末元初。」（一九三〇年跋）。元拓「猷」字本是朱翼庵首先发现的。六十年以后，马子云先生进而指出：朱翼庵旧藏元明间拓本，为现时所见此碑拓本之冠，较中晚期明拓「断鳌」未损本尚多六十余字（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二百六十五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需要说明的是，拓本的早晚，捶拓的精粗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例如一个拓得很早的拓本，但拓工粗糙，那么不仅书法的神采打了折扣，而且遇到考据之处也会显示不出来，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文物价值。所以，在一件碑的众多拓本中，只有捶拓早且拓工精者，方可谓「善本」。

五、碑帖收藏与研究的奠基人

故宫博物院于一九五五年建立专项库房，碑帖库设在延禧宫（插图二），库内储藏宏富，品类全面，总计有碑帖文物二万六千余件。现今存世可见的宋、明拓本大部分聚集于此。在这些藏品中，清朝内府旧藏的古代碑帖（内府镌刻者不在内）很少，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碑帖文物是在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陆续征集入藏的。其中碑刻、墓志、造像碑和造像题记、刻帖、刻经、清代宫廷刻石等，不仅数量多，而且包含了各个时期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均可自成系统。这对于故宫博物院形成自己的藏品特色十分重要，



（插图二）

对于陈列展览和科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画像石、金石集拓等文物，故宫也有丰富的收藏。历经几十年，故宫博物院逐渐建立起了一座古代金石碑刻的宝库，著名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便是宝库的奠基之人。

马衡（一八八一—一九五五年）（插图三），字叔平，浙江鄞县人，肄业于南洋公学。一九二二年担任北京大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任古物馆副馆长，一九三三年改任院长，一九五二年辞去该职，专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马衡先生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在方法上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传统，又注意进行出土文物的现场考察。在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到田野发掘的过渡中有推进之功，因而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并对宋元以来的金石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与提升。从文字的演变和有关铭刻的对比，论定石鼓文是东周时期秦国的刻石。根据新莽嘉量的实际测量，推定王莽时期以至汉唐间的度量衡。率队调查洛阳太学遗址，对汉魏石经资料作了收集、整理和全面研究。著作有《汉石经集存》（一九五七）、《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九七七）等。

马先生毕生搜集石刻拓本九千余件（含少量铜器拓本），其中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碑版、造像、石经为主。一九五五年先生去世之后，家人遵嘱将其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

除马衡先生外，著名的鉴藏家朱文钧、吴兆璜、蒯若木、张伯英、张彦生等，亦曾将珍护多年的碑帖善本转赠故宫博物院。朱文钧（一八八二—一九三七年），字幼平，号翼庵，浙江萧山入。幼年从师读经史诗文，曾入同文馆学俄文、英文。一九〇二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一九〇八年毕业归国在度支部任职。辛亥革命后在民国财政部任事。一九二九年受故宫博物院聘请为专门委员，鉴定书画碑帖。朱氏博学精鉴，有力收罗，所藏碑帖多为珍秘之本，如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李思训碑》、《孙过庭书谱叙帖》等，明拓《张迁碑》、《孔宙碑》、《崔敦礼碑》、《李靖碑》等等。并著《欧斋石墨题跋》一书，证史鉴碑，淹通博贯。他生前即与马衡院长有约，将所藏全部碑帖归诸国家博物院中以免流散。一九五三年朱家后人举碑帖七百余种捐献故



（插图三）